

城市受灾主因：规划不尊重自然格局

核心提示

100多年前,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道: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入夏以来,从北京到广州,一场又一场暴雨让人们再次领略了“不堪一击”的城市排水系统,也令城市规划和管理者面临前所未有的尴尬和考验。

据民政部最新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上半年全国有2.9亿人次因各类自然灾害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1420.3亿元。雪灾、火灾、暴雨,身处城市中的人们该如何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越来越多的城市灾害原因何在?又应该如何解决?

6月30日,记者专访了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地表现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史培军。在堆满了书籍和地图的办公室里,史培军和他的团队已就“城市合理布局与防灾减灾体系的建立”这一研究项目做了10年以上的研究。面对近期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暴雨成灾的现象,史培军表示,“城市规划不尊重自然地理格局”是形成灾害的主要原因。

城市受灾责任在建设者

记者:为什么今年入夏以来,人们感觉城市因下雨而导致的灾害越来越多?

史培军:究其原因还是城市规划没能遵循原来的自然地理格局。6月23日

北京暴雨中,积水严重的地方都是把原来的水系网络格局改了的地方。中国自古以来的城市规划是追求几何美,规划理念是美观的协调,不是景观的协调,其实城市本身并不存在一圈、两圈、越摊越大的环路型的自然地理格局。反之,西方的城市规划多是按照城市所在地的自然景观格局依山傍水而建。所以,我们的城市规划缺乏远见,太不尊重和没有考虑到大城市布局和原来自然地理格局间的协调,从而导致了大城市病的出现,来大雨成灾,下大雪成雪灾。

记者:如果以6月23日北京暴雨后的积水状况为案例,可否请您分析一下积水比较严重地段的形成原因?

史培军:这是城市建设者的责任,北京的总体地势是北高南低,此次暴雨正好也集中在西南部地势偏低的地区。比如积水严重的莲花桥,这里本来就是原来的河网,是相对地势低洼地段,在这样的地势情况下还向下挖了一个下沉式的桥,使此地成为逢雨必涝的场所之一。同理,去年北京的大雪,许多车辆都因为太陡而爬不上上拉式的西直门桥,造成大堵车。在南方少雪的地方,立交桥可以建得坡度大些,但是像北方这样的多雪城市,建设者就不能用平均设防能力代替特殊地段的设防能力,不能每次发生灾害后都推脱说“这是50年一遇的、几十年一遇的现象”。

记者:可否请您具体解释一下“平均设防能力代替特殊地段的设防能力”?

史培军:城市处于一个网络化连通的关系,没有从平均设防水平提高到特殊地段的设防能力加强,就会导致由于一个地方出问题,通过其网络和枢纽地段的问题而殃及全身。一场大雨好对一个城市的不同设防水平做了一个统一测验,高的设防水平必然也受到低的设防水平的殃及。比如旧的大院、旧的社区的排水能力和除雪能力弱,大雨或大雪来的时候也是专挑薄弱环节打。当然,现在城市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在提高,设防水平也在提高。

我们的应急预案都是战略性的

记者:目前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城市应急预案发展水平如何?

史培军:总体来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应急预案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简称市应急委)由市长郭金龙牵头,将主要突发事件划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23类,51种,我本人也是北京市应急委的专家,可以说重视程度是高的。但是为什么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雪灾、水灾时市民的感觉还是没有明显改善,或是没有根本上的改变,我个人认为应急预案中过多的理论性的、程序性的、普遍性的操作方式难以应对每次灾难个性化的东西,做不到随机应变。

换句话说,我们的预案都是战略性的而不是战术型的,可以想到大暴雨来了怎么办,但是没想到像6月23日在晚高峰的时候来一场大暴雨且降落在城市相对低洼的地方该怎么办,每一次的灾难都不一样,无法预测,缺乏灵活和细致的考虑。所以说总体在改进,局部在恶化,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善。

记者:市民在面对城市自然灾害时应做出怎样的应对?

史培军:关系到个人,我们在防御极端事件中的防范风险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对遇到自然灾害时的反应和认识程度还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从这一点来说,中国老百姓的防灾意识比日本老百姓差了很多。不懂最基本的概念,在大灾面前,对事情的严峻性估计不够,没有防御风险的基本逻辑,是保命,还是保财产?6月23日在大雨中推手被卷入下水井中不幸身亡的两名20岁左右的小伙子就是例子。缺乏最基本的风险防御意识,缺乏在灾难面前逃生的观念造成了惨剧的发生。

“南水北调”还是“北人南调”?

记者:您提到的城市建设应该遵循自然规律,但是像北京、上海这样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土地和水资源非常有限,像国外依山傍水而建的可行性有多大?

史培军:这就回到了要解决城市病这一问题的根本对策,即城市的规模要有限制的,不应该无限制地增长。对任何一个特定自然地理区域的大都市来说,它的自然负荷能力都是有限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不应该是更麻烦。我认为到了大力度限制大城市人口急剧增长的阶段。

人口增长负担过重和过快的城镇化都使得人地矛盾,人水与人自然资源的矛盾日益紧张。

记者:如果严控城市外来人口,是不是也影响了更多人追求教育、医疗等优质生存条件的机会?

史培军:一个地区的城市发展是有限的,在北京这样一个平均降水量500毫米左右、平原占不到1/3的地区,要养活近2000万的人口,压力可想而知,而且这一数据还在不断上升之中。尤其是这几年的水荒,就显得非常突出。南水北调工程还在进展之中,目前

还难以发挥作用。但是另外一种声音,“北人南调”是否可行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至于控制外来人口是否限制了一部分人的权利,首先城市的发展要保证已有居民的生活质量,其次要真正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并不是单纯让他们进城就可以了。进城不是根本问题,收入低、缺乏高质量教育和公共卫生资源才是他们进城的根本原因。试想如果加大了对农村、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同时提高农民收入,靠提高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异而不是单纯涌入城市,大城市人口过多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据《中国经济周刊》



大雨后的北京 (资料图片)



水淹北京 (资料图片)

国家级新区为何这么抢手

7月7日,中国的又一个明星区宣告诞生。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国新办宣布,国务院已正式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

这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之后的又一个国家级新区,也是国务院批准的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

这意味着,舟山,这个浙江省陆地面积最小的城市,在制度的安排下,即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耀眼的明星。

此前,另一有力竞争者对手陕西西咸新区,通过高配新区一把手的方式做最后的冲刺,亦足见“国家

级新区”角逐竞争之激烈。事实上,在中央给予地方的各种区域安排中,各省市均会有一番激烈的角逐,其中,又以“国家级新区”的竞争最为激烈。

“国家级新区”,这是区域发展中一种高规格的制度支持,包括税收上的减免,项目落户上的照顾,土地政策上的优惠以及其他经济社会发展中方方面面的先行先试权。

稍微回看一下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不难发现:通过给予政策上的倾斜,项目、资金、资源迅速向明星区域集中,催生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GDP高地。再看看最新批复的舟

山,又得到什么样的礼遇?根据批复,国家给予舟山的功能定位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区,海洋综合开发实验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根据舟山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未来的新区要建设成为

中国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加工交易中心、东部地区重要的海上开放门户、海洋海岛综合保护开发示范区、重要的现代海洋产业基地以及陆海统筹发展先行区。

批复中还要求,国家各部委、办、局,在规划编制、政策实施、项目安排、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等各方面给予舟山积极的支持。

这一切当然是所有行政区域梦寐以求的礼物。但从发生频率来看,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诚然,在浙江,舟山这个最小的城市,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它的发展一直乏善可陈,基础薄弱,远远落后于那些兄弟明星县市。不过,这又有什么用?在中国,某种程度上,决定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快慢的,是国家的制度支持力度。国家级新区=项目+资金+政策。可以预见,不久以后的舟山将收获这一切。据《中国经济周刊》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9 E-mail:cpyp@163.com

频频垮桥是重要警醒

5天内,3座大桥相继发生坍塌事故:11日,建于1997年的江苏盐城境内328省道通榆河桥坍塌;14日,建成不到12年、造价逾千万元的当地标志性工程武夷山公馆大桥倒塌;15日,通车仅14年的杭州钱江三桥引桥桥面塌落。在武夷山,大桥倒塌还造成一辆旅游大巴坠落,致1死22伤。

这样的事故,让人不由回溯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垮桥惨剧:2010年的河南梁川大桥,2009年的湖南株洲高架桥,2007年的湘西凤凰桥,1999年的重庆彩虹桥……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造桥历史的民族,却必须接受“桥塌塌”频发的现实,令人痛心,也让人追问:我们的路桥是否“提前”进入了风险期?

事故发生后,当地各部门迅速抢救受伤群众,武夷山大桥和钱江三桥相关方面相继召开新闻发布会,专家们迅速鉴定了事故原因。然而,这无法让人安心下来。这两座大桥的垮桥直接原因被归于货车严重超载。在媒体公众追问之下,有关方面才继续承认“桥梁存在缺陷”、“管护缺位”。这样的态度,不免有些“狡辩掩盖事实”,难怪公众质疑。

据调查,钱江三桥的裂缝隐患其实早已出现——4年前已有网民预言过它的塌陷,理由是当初的建桥指挥者因腐败入狱;而武夷山大桥的“超负荷”现象,5年前已现苗头,只因业主与公路管理部门互踢皮球无人养护,一直带病运行。

这仿佛已成惯例:利益丰厚时争相管理,事故一出则互相推诿;日常养护、监察过程中缺少科学规范和严格执行,明知存在隐患也带病运行,而不肯防微杜渐。如此管理方式和应急反应的惯性思维不改,不堪“超载”而必定要在某个节点上“偶然垮塌”的大桥,只怕还会此起彼伏。

我们的确需要管理部门和相关责任人迅速回应公众,但不是“张口就来”,更不是推诿塞责。就一座大桥的垮塌来说,不论设计、建设还是事故调查,必须有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与专业论证过程。

事实上,更需科学拷问的是,超载究竟是“元凶”还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为什么经过专业设计和严格施工的桥梁会如此弱不禁风?为什么由先进材料建成的桥梁竟如此“短命”?

本该成为“百年工程”的大桥,一座座相继成了“短命桥梁”甚至“索命大桥”,不仅给公共财产带来巨大损失,还制造了社会风险,更危及人的生命。这种现象尤其值得深思,需要专家认真调查原因,管理者积极主动承担责任,让财政投资少些损失与浪费,百姓生命多些安全与保障。更需要提醒各地的,是及时监控和修缮存在隐患的路桥,彻底杜绝“桥塌塌”。 王国

“中华脊梁”还挺得直吗

有网友爆料说,自己被提名“中华脊梁”候选人,但要交9800元钱。记者调查发现,该活动的官方网站也已经关闭,邀请函中留的手机号和座机都无人接听。(7月17日新京报)

口口声声是评选“中华脊梁”,却把眼睛盯在了人家的荷包上,毫不遮掩地张口就要钱,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其实,类似于这种花钱评奖的少儿游戏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民众再没见识也不至于为这事吓一跳,真正让我们吃惊的是,这种事竟敢打着评选“中华脊梁”的旗号出现。诚然,在类似骗术越用越滥的时候,不下点力气琢磨个唬得住人的名字也难以引人上钩,可你也不至于连蒙家的底线都不要了,有多大吹多大吧?

交钱就能有幸成为“中华脊梁”,这样的评选有多大的含金量,无论是候选人还

是主办方,恐怕都心知肚明。为了这个虚名,“不差钱”的候选人别说是9800元,就是98000元都舍得;对于主办方而言,张张嘴就能赚个盆满钵满更是一笔万利的买卖,说得难听点,这出闹剧本身就是一出蹩脚的戏,本来就是个圈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场上的两个“演员”都心知肚明,真正比吃了苍蝇还恶心的,是台上的观众。我们不能不叫,得了爱财的“软骨病”,评出来的“中华脊梁”还挺得直吗?

如果某些人非愿意给自己的名字前加上长长的一串



头衔,那也无所谓,但是,请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别对着公众显摆,主办方更不能以伤害民众的感情为代价往人家脸上贴金。尤其是,不能

因为主办方自己对金钱弯下了腰,就逼得“中华脊梁”也佝偻着身子,这样做是要被民众在后面戳脊梁骨的。 晓妍 文 朱慧卿 绘

“最美妈妈”为何赢得全社会喝彩

7月,杭州,生死瞬间,一个平凡的女人创造了一个爱的奇迹——她不顾个人安危的惊人一抱,挽救了一个幼小的生命。她叫吴菊萍。人们称她为中国的“最美妈妈”。

人们感动着,感慨着,传播着,传递着,全世界都知道了吴菊萍救起小妞妞的故事。在关于她的故事中,人们发现,有几个词反复出现:本能、普通、习惯性流露——

吴菊萍说: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本能,是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情;我一直很普通的,真没啥特别的。吴菊萍的丈夫说:她平时和今天所做的都只

是这些善良的习性流露而已;菊萍也不想大家把她称为英雄,因为她觉得这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事情。吴菊萍的老师同事说:她平时就是一个挺善良,挺有责任感的人;她伸手救妞妞,其实是这种本性的习惯性流露。吴菊萍的乡亲们甚至说:我们身边英雄很多,有些人比菊萍救小孩还更英雄;菊萍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由此,更让我们思考的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做了自认为普通的事,却为何在全社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

其一,普通人的高尚行为更能体现纯洁的人性,更具震撼力

量。如果接住妞妞的是超人或蜘蛛侠,原本也不值得惊诧了。而吴菊萍是一个普通的妈妈,有一个8个月大的儿子,她却以生命的代价去托住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孩子。这种“本性的习惯性流露”,看似自然又简单,其实最艰难,是一种经年的累积,如果不是长久以来的善良积淀,很难想象会有危急时刻的爆发。

其二,“最美妈妈”做了别人或许想做但却未必会做的事,她的行为触动了人们心中的善念。孟子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

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依此来看,现实社会中人们需要帮助的人或事面前止步,确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最美妈妈”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照进人们心灵。她于平凡中孕育出人性的光辉,激发了人们心底向善的力量。

吴菊萍那关键时刻的一伸手,展现了人性的精彩。人们为这份精彩喝彩,这是向善社会的一大进步。希望每一个普通人或普通的人都能记取这份精彩的传递,善待身边的人,用爱交织身边的事。 红丽

靠“群众演员”的听证会没有公信

听证会正在遭遇空前的公信力危机,这次听证专业户的集体“亮相”,突破了公众的承受尺度。要有效遏制听证专业户现象,就需改革现有制度。

随机抽签次次“被选中”,7年里一共参加过19次听证会,这两天网络上晒出成都有四名“价格听证专业户”,其中一名老妇竟然19次参加各类听证会,引起网友转贴拍砖,直呼“被代表”,更有人称其为成都听证会的“最牛群众演员”。

听证专业户其实是新闻,此前合肥曾经出现过职业听证人。听证专业户的可怕在于,他们犹如会说话的机器,仿佛被设置了固定程序,只会说“是”,不会说“不”。他们扮演的角色偏偏是消费者代表,有的听证专业户理直气壮地表示,“政府收任何费都有理”。试问,这究竟代表谁的心声?

听证会正在遭遇空前的公信力危机,这次听证专业户的集体“亮相”,突破了公众的承受尺度。追溯历史,我国引入价格听证制度,至今不过十余年时间。听证制度的设计初衷充满着善意与进步,通过听证代表的观点博弈,使政府决策趋向合理化。设立听证会制度,也是实现公众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等权利的一种方式。但近年来,听证会越来越被诟病,不少人惊呼听证会就是走过场,听证代表就是内定,以至于公众的参与热情锐减,东莞居民水价听证,征集听证会参加人,却无人买账就是例证。

听证会沦为人人抱喜甚至避而远之的局面,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制度无力。早在2002年12月1日,我国正式施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2008年12月1日,《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正式施行。但遗憾的是,这些规定并未得到有效执行,一些价格上涨根本就不举行听证,亦非新闻。

二是管理缺失。《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明确规定,定价听证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织。按说价格主管部门应该不偏不倚,确保权力节制,维护公共利益,但是不少部门表现得十分暧昧,垄断企业一呼百应,它们立马呼应,甚至鞍前马后地为之效劳。在遴选听证代表时,故意挑选那些听话的、与垄断企业保持一致的代表。由于信息不透明,公众无法监管,往往听到涨声一片,但为时已晚,徒唤奈何。

要有效遏制听证专业户现象,就需改革现有制度。听证会不妨委托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组织,在信息披露上应确保最大程度的透明,程序怎么设置,公众怎么参与,代表怎么选,现场如何博弈……都应阳光化,而不是秘密操作、选择性运行。令人欣慰的是,不少人大代表已经建言制定《听证法》,也许法律完善了并能得到严格落实,听证乱象才能少一些。 春亚